

读 点 鲁 迅 著 作

学习鲁迅同“蛀虫”斗争的宝贵经验

唐达晖 陆耀东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三十年代，他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隐藏在革命营垒里的“蛀虫”——周扬等“四条汉子”及他们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今天对于我们开展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鲁迅从长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践中，深刻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他多次指出，这种“蛀虫”的危害性，甚于正面的敌人，告诫革命者“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他强调路线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必须“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不就是由于党内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放弃了革命领导权吗？鲁迅在一九二八年就深刻总结了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指出敌人的武力不可能消灭革命，可是内部的机会主义却可以导致革命失败，所以说“蛀虫”是最可怕的。三十年代，周扬一伙就是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干着“内里蛀空”的勾当。他们在政治上疯狂推行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则大搞

宗派主义，网罗牛鬼蛇神，结党营私。他们结成以“四条汉子”为核心的宗派小集团，把持了“左联”的领导权，排斥和打击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在革命队伍内部制造分裂。正如鲁迅所揭露的，“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艺界，弄得乌烟瘴气”。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初，周扬一伙在王明、刘少奇指使和支持下，抛出了“国防文学”这一资产阶级口号，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大造反革命舆论，大肆鼓吹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鲁迅揭露他们的要害，是迎合阶级敌人的需要，“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他们背着鲁迅，解散“左联”，鲁迅指出：“那是溃散”。

“蛀虫”之所以最可怕，还由于他们“挂着好看的招牌”，具有比公开的敌人更大的欺骗性。他们披着“共产党员”、“革命者”的外衣，打着“革命”的旗号，利用自己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甚至盗用党的名义，蒙骗群众，打击异己。路线觉悟不高的人，往往被他们的外表所迷惑，受骗上当。鲁迅揭露周扬一伙“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他们做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起到了公开的敌人所不能起的反动作用。

总之，“蛀虫”的特点，就是“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的工作”。所以鲁迅一再表示，对于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二

鲁迅在同周扬一伙“蛀虫”的斗争中，运用马列主义的锐利武器，从他们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活动特点等各方面进行剖析，有力地揭示出了他们的机会主义反动实质。

鲁迅不是把他们的活动，看作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把它置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斗争的背景下，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动向，作为时代历史的产物来加以考察和分析，把他们的阶级实质如实地揭露出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国内外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代理人。鲁迅根据周扬一伙所作所为，曾尖锐地提出“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的问题，还曾揭露他们“和‘第三种人’一气”，从本质上揭示了他们同反动派的关系。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同敌人一致，实际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反动派别。当徐懋庸在周扬指使下写信攻击鲁迅时，鲁迅就敏锐地看出：“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这“一群”，不仅是他们那个机会主义宗派小集团，而且代表着反动派和资产阶级。所以鲁迅旗帜鲜明地表示，这种斗争决非“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而是关系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大局”的事，决没有调和的余地。

从这些人的阶级出身和思想根源来看，有的是“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有的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们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又不认真改造思想，“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虽然参加了革命，入了党，但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参加革命，根本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解放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目标，而是为个人找出路，“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因此他们“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把入党，把为革命做点工作，都当作“入股”，当作抬高自身的“商品”价值的手段。他们自以为“高于一切人”，一心追求资产阶级法权，只想“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鲁迅早已尖锐地指出，这种人是很容易由左翼成为“右翼”的。这样的人混在革命队伍里，平时是“狮子身中的害虫”，一到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或革命的转折关头，就要现出原形，“走出阵线之外”，离开革命，乃至站到革命的对立面去了。

“蛀虫”从不光明正大，专搞阴谋诡计。鲁迅深刻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和手段，主要是：

“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也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或以党的领导者、党的代表自居，发号施令，实则是一个“工头”。或是接过革命口号，加以歪曲利用，一方面推销自己的修正主义黑货，一方面打击反对者，“小不如意，就倚势(1)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当鲁迅识破和抵制了周扬一伙推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阴谋时，他们就是打着“统一战线”的旗号，把“破坏统一战线”，“破坏国家大计”，“左的宗派主义者”，“托派”……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向鲁迅抛来。

口蜜腹剑，两面三刀，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鲁迅揭露他们向来是“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例如一九三二年鲁迅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批评周扬一伙的恶劣倾向时，周扬公开表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去理解”，暗中却又指使喽罗党羽，写文章大肆诬蔑鲁迅。这样的事例很多，所以鲁迅愤慨地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有时政治骗子们也会“自打两个嘴巴，滴几滴眼泪”，赌咒发誓，说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其实“赌咒的实质还是一样，总之是信不得”。这不过是他们一时以曲求伸之计，旧帐并未抹掉，一旦时机到来，“抓到一面旗帜”，马上就是另外一副面孔，“横暴恣肆，达于极点”。

造谣言，放暗箭，是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政治骗子的另一种惯伎，也是他们的重要法宝。鲁迅早就说过：“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鲁迅曾怒斥“四条汉子”之流的“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指出了造谣

是腐朽没落阶级使用的伎俩，但是并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

鲁迅十分重视研究“蛀虫”的活动规律和战法，正是为了从他们的卑鄙手段，看清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同时为了更好地用革命的策略，去对付他们的反革命策略。

三

三十年代中期，由于路线斗争的白热化，鲁迅就把对革命队伍内部“蛀虫”的斗争，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去。他教导人们，对这种“蛀虫”，也如同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黑暗势力一样，“除却与之战斗以外，更无别法”。鲁迅的宝贵战斗经验，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和教益。

第一，要有反潮流的彻底革命精神。当时周扬一伙篡夺了文艺界的领导权，飞扬跋扈，摆出一副“工头”的架势，真是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对鲁迅大布围剿阵。处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鲁迅毫不退缩，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鲁迅之所以具有这种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首先是他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自觉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他认为必须揭露周扬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除了为革命，为人民，他没有任何个人目的。无私才能无畏，所以尽管周扬一伙“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甚至用“实际解决”来恐吓的时候，鲁迅也没有被他们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不怕打击，不怕孤立，在沧海横流之际，成为中流砥柱，抗击着险风恶浪，坚持了革命的正确方向和路线。

第二，掌握马列主义的锐利武器。鲁迅之所以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潜入革命内部的“蛀虫”，是由于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把理论学习同斗争实践结合起来，把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毛主席指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的经验证明，“蛀虫”是可以识破的，路线斗争是可知的。鲁迅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有了真金就可以鉴别貌似金子的硫化铜；掌握了马列主义这一“最明快的哲学”就可以识别和战胜机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政治骗子。

第三，“捩其华袞，示人本相”。“蛀虫”都披着“革命”的外衣，所以对待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撕下他们那好看的伪装，使之露出原形。鲁迅的经验是要抓住机会主义路线的政治上的要害，予以揭露批判。既深入解剖它的反动政治目的，理论基础，又戳穿其“捣鬼术”——五花八门的反革命策略手段。鲁迅最善于“揭穿假面”，用马列主义的照妖镜，“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一切搞机会主义的人，都是不得人心的，他们从根本

上违背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他们虽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蒙蔽一部分人，但正如鲁迅所指出：“蒙蔽是不能长久的”。一旦把他们的真相公之于众，他们就会更加孤立，就会招致更多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受蒙蔽者——的反对。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斗争，坚持了这种战法。他在逝世前不久还说：“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

四，“必须坚决，持久不断”。机会主义的产生，有深刻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因此，必须看到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要反对中庸之道，反对折衷主义，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鲁迅总结以往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人们，切不可“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他一生坚持了“打落水狗”的“韧”的战斗精神，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战斗到底。一九三六年秋，正当鲁迅把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批臭时，刘少奇、陈伯达就大叫“休战”，想在“休战”的烟幕下，掩护他们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鲁迅进攻，而不准鲁迅回击。鲁迅看透了他们的险恶用心，认为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坚持和他们斗，表现了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最危险的。他们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动表演，使革命人民更看清了走资派的真面目。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时也要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经验，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